

唐代的精怪小说

杨民苏*

摘要 我国古代的精怪小说,六朝时已兴盛,但由于作家们把精怪故事当作实有,而创作上也偏重于实录,因而其中虽不乏名篇,而其主要特色仍为神秘怪异,甚至荒诞无稽。到了唐代,由于作家们“有意为小说”,用精怪小说来露才炫己借以表现自己的理想情操,也即成为作家们言志、述怀和抒情之作,因而无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关键词 中国古代文学 唐代 精怪小说

我国古代的精怪小说,远在六朝时就已兴盛。所谓精怪小说,就是作家把各种大自然现象(雷、雨、风、云)以及各种植物、动物(如花草树木,飞禽走兽,龟蛇鱼虾以及牛马猪羊)甚至器用杂物写成都成精变物或化成人类来为善为恶,与人发生各种纠葛,从而产生各种各样的故事。不仅如此,一些作家还根据神话传说,杜撰出一些生活中没有的动物如龙及夜叉等为精怪的故事,使得这类小说充满了极其怪异神秘的色彩。但在六朝以前,作家们把这类故事当作真实之事,写作上又偏重于实录,因而其中虽不乏名篇佳作,而更多的则是充满了怪异、荒诞,甚至恐怖。情节上也过于平铺直叙,极少动人之处。到了唐代,由于作家们“有意为小说”,通过小说来显才、言志、述怀及抒情,因而反映现实生活题材的传奇小说特别兴盛,而志怪小说则退居次要地位。尽管如此,仍有部分作家致力于志怪小说的创作,也通过这些小说来显才、述怀、言志抒情,因而使得志怪小说特别是其中的精怪小说无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远远超过了前代,给后世以深刻的影响。

一、唐代精怪小说的主要内容

唐代的精怪小说,除了少数因袭六朝为写精怪,无意义的作品之外,大都为显才、言志、述怀抒情之作。

所谓“显才”主要原因是由于唐代科举制度的实行,为广大的中下层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展示了登科入仕的前途,而唐代的知识分子,不仅在诗歌创作上有较高的造诣,而在散文、小说方面也有着出色的写作能力。这样,一方面他们有才可显,另一方面,也必须通过显才,即通过“行卷”、“温卷”以取得名人的推荐,才能达到登科入仕的目的。因而不但诗歌在

文稿收到日期: 1992—12—17.

* 作者系昆明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副教授.

唐代大盛,而小说也随之盛行起来,特别是精怪小说,更是士人举子显才炫己的良好工具,所以这类作品中名篇佳作颇为不少。这些作品,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为单纯的显才之作,主要目的在于炫耀作者的知识与才华,并无多大的思想性,然而这类作品却写得五彩斑斓、妙趣横生,令人忍俊不禁,爱不释手。

炫耀知识的作品以裴铏《传奇·宁茵》、薛用弱《集异记·张华》二篇最佳。《宁茵》篇写懿宗大中年间,秀才宁茵,“因夜风清月朗,吟咏庭际”,实有“班特处士相访”,他自称为“田野之士,力耕之徒,向田亩而辛勤,与农夫而齐类,与农具为邻”。并说他“少年之时,兄弟竟生头角,每读《春秋》,至颖考叔挟舟以走,恨不得佐辅其间,读《史记》至田单破燕之计,恨不得奋击其间;读《东汉》至光武新野之战,恨不得腾跃其间”,接着,又有“班寅相谒”,他自称“出自斗穀於菟,有文斑之相,遂命氏”,其祖先为“远祖班固及婕妤,好辞章,大有称于汉朝,有传出于史。……”自己也“世为武贡中郎”,宁茵招待二人,“出鹿脯,寅啗须臾而尽,特却不茹”,说“无上齿,不能咀嚼”,酒数巡后,特与寅发生口角,相互责难。特责寅为“爪牙之士,而苦相凌”,寅责特为“有角之士而苦相诋”,二人又互揭其短。特讥寅徒“夸猛毅之区,若值人如卞庄之士,为齧粉矣。”寅嘲特徒“夸壮勇之力,若值人如庖丁,当为头皮耳。”酒散的第二日,宁茵“视其门外,惟虎蹄牛迹而已。”原来班特乃牛精,班寅乃虎妖。人、虎、牛共饮酒欢宴,已属怪异,而作者却通过二精怪自我介绍和相互责难、讥嘲,把有关牛虎的特点和掌故全盘托出,极为有趣。“特”的古义为牛,“田野之士,力耕之徒,向田亩而辛勤……与农具为邻”,为牛之用途;颖考叔乃春秋时郑国牛倌,每逢祭祀时,就把牛修饰一番;田单用火牛阵破燕,刘秀起义时因马不足而以牛代,这些皆有关牛的掌故。有角之士及不食鹿脯,乃牛之生理特点,而庖丁解牛乃《庄子》中的名段。至于“寅”乃虎之属相,班固曾著《白虎通义》一书,春秋时楚将斗穀於菟传为虎养大,卞庄刺虎见于《史记·张仪列传》,“爪牙之士”和“食鹿脯须臾而尽”乃虎之生理特点,文中句句含虎义牛义,而句句均无“虎”、“牛”二字,这明明是作者在显其才华,而又使小说充满了滑稽性和趣味性。

《张华》篇则写张华与狸精比学问之事。张华乃西晋人,博学多才,所著《博物志》一书,享盛名。小说写“有一斑狸,积年能幻化,乃变作一书生”去见张华,欲与其斗才。小说生动地写道:“华见其总角风流,洁白如玉,举动容止,顾盼生姿,雅重之。于是论文章,辩校实,华未尝闻此,复商略三史,贯三才,箴八儒,通五礼,华不应声屈滞。”说明张华远非其对手。但小说并非如此就简单结尾,小说还作了这样的渲染:斑狸在见张华之前,先去征求燕昭王墓前之华表(另一精怪)意见,华表曾劝阻它说:“子之妙解为无不可,但张司空智度恐难笼络,出必遇辱,非但丧千岁之质,亦当深误老表。”而狸不听。果然在难倒张华之后,张华便认为“天下岂有此年少?若非鬼怪,则是狐狸。”于是便对它进行严密的监视,又请来博物之士丰城令雷焕邦助识别。雷对张说:“魑魅异狗,所别者数百年物耳。千年老精,不复能别。唯有千年枯木照之则形见。”而这枯木乃燕昭王墓前之华表。于是张华派人去伐华表,华表曰:“老狸自不自知,果误我事。”伐时“于华表座中青衣小儿,长三尺余,将还至洛阳,而变成枯木。”“燃之以照书生,乃是一斑狸。”这时张华叹曰:“此二物不值我千年不可复得。”小说题旨在于炫耀其博学多才以及赞扬博学多才之人。写得如此生动妙不可言,在六朝小说中是找不到的。

另外一些作品则是写精怪赋诗或与人评诗,目的在于炫耀作者的诗才和文才,其中一些

诗也颇有意境，情节上也富于情趣。这以牛僧孺《玄怪录》中《元无有》和《柳归舜》二篇为佳。《元》篇写宝应元年，一个名叫元无有的人，独行维扬郊野，晚上入路旁空庄，憩于北轩，“忽闻西廊有人行声，至堂中，有四人，衣冠皆异，相与谈谐，吟咏甚畅。”他们决定“为文以纪平生之事”，其中一衣冠长人吟：“齐纨鲁缟如霜雪，响亮高声为子发。”黑衣冠短陋人则吟：“家贫长夜清会时，辉煌灯烛我能持。”故弊黄衣短陋之人咏的是：“清冷之泉俟朝汲，桑纁相牵常出入。”第四个黑衣冠短陋之人则咏：“爨薪贮水常煎熬，充他口腹我为劳。”元无有又“观其自负，虽阮嗣宗《咏怀》亦不能加耳。”可是天明之后，“无有就寻人，堂中惟有故杵、烛台、水桶、破锅，乃知四人即此四物所为也。”从四怪所咏之诗看，的确生动地表现了四物的特点。故杵自然“长”，杵声自然“响亮”；烛台自然出现于“长夜清会时”，自然是“持”着辉煌的灯烛；水桶打水，自然为“汲”“清冷之泉”，为“桑纁相牵”而“出入”；破锅自然是用来“贮水”、煮饭，饭熟后“充他口腹”。这类谜语式诗显然是为显示作者的诗才文才而作。《柳》篇则写得更为出色。小说写柳归舜于隋开皇二年自江南抵巴陵，被大风吹至君山下，遇上数千鸚鵡，先闻其唱歌，后受其招待并听其吟诗、谈论身世评论时人作品。作者在文中竭力铺排渲染，使读者目不暇观。

首先，小说生动地描写了鸚鵡所在的环境：柳“维舟登岸，寻小径，不觉行四五里，兴酣，逾越该润不由径路，忽道旁有一大石，表里洞彻，园而砥平，周匝六七亩。其外，尽生翠竹，园大如盎，高百余尽，叶曳白云，森罗映天，清风徐吹，戛为丝竹音，石中央又生一树，高百尺，条干偃阴，为五色，翠叶如盘，花径尽余，色深，蕊深红，异香成烟，著物霏霏”。景色鲜明而又极为优美。

接着小说便写道：“有鸚鵡数千，丹嘴翠衣，尾长二、三尺，翱翔其间，相呼姓字，音旨清越。”它们随即又唱出了动人之歌。有的歌是汉武帝钩弋夫人常唱的；有的则唱出了汉武帝陈皇后失宠之后请司马相如作《长门赋》之事；一鸚鵡在赋司马相如《大人赋》后说了它的经历：“吾初学赋时，为赵昭仪抽七宝钗横鞭，余痛实不彻，今日诵得，还得终身一艺。”众鸚鵡见到柳后，极为热情，请出了名叫凤花台的鸚鵡为他吟诗，博得了柳的赞扬，凤又自叙其身世：“在王丹（东汉人）左右有一千岁余，杜兰香（传说中西王母之女）教我真篆（仙经），东方朔授我秘诀。汉武帝求太中大夫，遂在石渠署见扬雄、王褒等赋颂，始晓箴论，王莽之乱方得还吴，后为朱然（三国时人）所得，转遗陆逊，复见（陆）机、（陆）云制作，方学篇什，机、云被戮，便至于此。”凤接着又问柳，近日谁为文坛宗将，柳回答是薛道衡和江总，“因诵数篇示之”，凤评之曰：“近代非不靡丽，殊少骨气。”众鸚鵡又招待柳进餐：“珍羞万品，目所不识，甘香裂鼻。”这种写法充分展现了作者的文才、诗才，构思是多么奇特，想象是多么瑰丽！王丹乃后汉人，却写于汉武帝之前，两汉至唐也没有一千年，江总、薛道衡也非唐人，但些在小说中安排得极其自然，似乎顺理成章，所以鲁迅在评论唐代小说时说：“煊赫莫如牛僧孺之《玄怪录》。”^[1]

这类作品最为出色之处是在情节的安排上，充分发挥了作者的文采与异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上：

奇上加奇或奇中有奇。这就远远地超过了六朝的单一之奇，因而读时趣味盎然，读后余味无穷。《宣室志·裴少尹》篇可谓这方面的典型作品。小说写贞元间江陵少尹裴君的10余岁儿子突然生病。“旬日益盛，医药无及。裴君力求道术士用呵禁之，冀瘳其苦。”果然来了一

个姓高的术士,他说:“此子非他疾,乃妖狐所为耳。”于是很快被治愈,可是“他疾虽愈,而神魂不足,往往狂语或笑哭不可禁”,这时又来了一王姓道士,“自言有神符,能以呵禁除去妖魅疾。”见裴子后,大惊说:“此郎君病狐,不速治当加甚耳。”裴君谈到了高生,王生笑曰:“安知高生不为狐?”接着高生又见到了王生,便痛斥裴君,“奈何此子病愈,而乃延一狐于室内耶?”二人互指对方为狐,“相诟辱不已”。正在此时,又来了一个自称能为裴子治病的道士,见二人后便指二人为狐,二子也反指道士为狐,互相漫骂不止,之后,便关上门进行斗殴,使得“裴君益恐,共家僮性感,计无所出。”但“及暮,阒然不闻声,开视,三狐皆仆地而喘,不能动矣。”于是裴君尽杀之,“其子旬月乃愈矣。”狐治狐媚,先后来者皆狐,直至斗殴现形,读之令人忍俊不禁。

场面热烈精彩,气氛浓郁,使人浮想联翩,这以《玄怪录·岑顺》篇最为出色。岑顺“少好学有文,老大尤精武略。”他“旅于陕州,贫无第宅”,而其外族吕氏有山宅,将废之,于是岑顺便要求住在那儿,接着怪事便发生了。一次他夜中“闻鼓鼙之声,不知所来,及出,则无闻。”他不但不惊,反而高兴地认为是“石勒之祥也”。石勒乃十六国时后赵的国君,传说他曾梦闻鼓鼙之声,后方登基。于是,岑顺视之曰:“此必阴兵助我,若然,当言明我富贵期。”果然数夕之后,他梦见一个身穿甲冑的将军来见他说:他是奉金象将军之命来请他,因“敌国犯垒”而“侧席安贤”。岑表示愿意应征后“忽然而寤,恍若自失。”但“俄然鼓角四起,声愈振厉。”“须臾,户牖风生,帷帘飞扬,灯下忽有数百骑飞驰左右,悉高数寸而被坚持锐,星散遍地,倏忽之间,云阵四合。”接着便传来了金象将军的檄文,说他的国家因“地连獯虏,戎马不息,向数十年,将老兵穷,姿霜卧甲,天设劼敌”,现在“天那国与北山贼合从,克日会战”,并感谢岑来应征。接着便开始了热烈的战斗场面描写:“夜关后,鼓角四发”,“先是东面壁下有鼠穴,化为城门,垒敌崔嵬,三奏金革,四门出兵,连旗万计,风驰云走,两皆列阵。其东壁下是天那军,西壁下是金象军,部署各定”,战斗开始后,“鼓之,两军俱有一马斜去三尺止。又鼓之,各有一步卒横行一尺。又鼓之,车进,如是,鼓渐急而各出,物包,矢石乱交,须臾天那军大败,奔溃,杀伤涂地……金象军大振,收其甲卒,舆尸横地……。”胜利之后,金象王“神貌岸然,雄姿罕俦,宴饌珍筵”,并“与顺致宝贝明珠珠玑无限,顺遂荣其中,所欲皆备焉。”这绘声绘色的战斗描写场面是何等热烈,气氛是何等浓郁!后来岑顺酒后失言,告诉了家人此事的经过,“其亲人潜备锹钬……荷锤乱作,以掘室内八、九尺忽坎陷,是古墓也。墓有砖堂,其盟器悉多,甲冑数百,前有金床戏局列于满枰,皆以金铜成形,其干戈之事备矣。”这时,岑顺才醒悟到所谓战争,“乃象戏行马之势也。”至此,全文结束,使人浮想联翩,感到美不胜收。

另一类也是更多的作品则是通过精怪故事来言志、述怀、抒情,也即表现作者理想情操以及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中各种问题的看法,内容极其丰富多彩。

一些作家笔下的精怪小说,实际上是对我国历代在科技、技艺以及艺术等方面所取得的卓越的成就进行赞扬。张鷟的《朝野僉载·石桥》、《玄怪录·曹惠》及皇甫氏《原化记·圣画》篇就是这方面的名篇。《石桥》篇先写赵州桥之精美:“望之如初月出云,长虹饮涧,上有勾栏,皆石也,勾栏并为石狮子。龙朔元年,高丽谍者盗二狮子去,复募匠修之,莫能相类者。”然后又加以神奇般的渲染:“天启大足年,默啜破赵定州,贼饮马南过,至石桥,马跪地不进,但见一青龙卧桥上,奋迅而怒,贼乃遁去。”《曹惠》篇则表现了我国雕刻工艺的精

湛水平。小说写高祖武德初年，江州参军曹惠的官舍佛堂中有二木偶人，他拿回去给其幼子玩，幼子“方食饼，木偶即引手请之。”幼子惊恐，曹惠闻之后说：“取木偶来。”二木偶马上抗议说，我二人名叫轻素、红素，不叫木偶。接着便“转盼驰走，悉无异人。”同时，又自我介绍说：她们原是南朝宣城太守谢朓家的俑偶，为沈约家老苍头所刻。谢朓被杀后，以此木偶殉葬，但未及临葬又被二贼劫去，以至辗转至今。又言“卢山神欲索轻素为舞姬久矣。”可见其雕刻工艺之精湛和人们的鉴赏水平。《圣画》篇则更为曲折美妙。小说写长安云花寺圣画殿七圣画之由来。“初，殿宇既制，寺僧召画工，将命施彩画，会贵其值，不合寺僧所酬，亦竟去。”后有二人自称善画，并表示不要酬金，只是作贡献。僧怀疑二人无技，便要先看其过去所画。二人又说他只弟七人不曾在长安作过画。然而“僧利其无值，许之。”于是“后一日，七人果至，各繫彩绘将入其殿。”入殿前他们告诉寺僧：“从以七日，慎勿启吾之门，亦不劳饮食，盖以畏风日所侵铄也。可发泥锢吾门，无使有纤隙，不然，则不能施其妙矣。”寺僧自然答应其要求，但过了六天，寺僧们认为：“此必无他怪也。”遂不守诺言，打开了门，于是怪现象出现了：“户既启，有七鸽望空飞去，其殿中彩画俨然，四隅唯西北墉未尽其饰焉。”后来又请来画工，见之，大惊曰：“真神妙之笔也。”于是“无敢继其色者”。

更多的精怪小说则是从各个方面深刻地表现了唐代的社会现实和作者的理想情操。

不少的小说对于搞分裂的藩镇和残酷的官吏进行了深刻的讽刺。《宣室志·李师道》和《三水小牍·张质方》二篇颇具特色。前篇开头这样写道：“唐元和中，李师道据青齐，蓄兵勇锐，地广千里，储积数百万，不贡不觐，宪宗兵将讨之，王师不利，而师道益骄，乃建新宫，拟天子正殿，十日而居。”可是这种行为为天所不容，“是夕，云物遽晦，风雷如撼，遂为震倾圯，俄复继以天火，了无遗者。”于是青齐人相顾语曰：“为人臣而逆其君者，祸固宜矣。今滴见于安可逃其戾乎！”而且，“旬余，师道果诛死。”作者的目的虽然在刺“为人臣而逆其君者”，但藩镇作乱对唐代的经济繁荣造成的损失及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均无法估计，因此作品不无进步意义。《张质方》篇写卢龙军节度使张质方极其飞扬跋扈，他“出绮纨之中，据方岳之上，未尝以民间休戚为急”，尽其搜刮之物以贡献京城，又升为左武卫将军，在大规模打猎时，又“往往设置罟于道，则犬彘无遗。”即百姓的猪犬也被视为猎物掠走。而“臧获（奴从）有不如意者，立杀之。”真是残酷已极。而其母也得意地说：“尚有尊于我子者邪！”小说接着写张之好友王知古出猎时，得遇一狐仙，狐仙甚爱王知古，并欲将其女给王为妻，可是当得知王乃张之好友时，狐仙“忽惊叫仆地，色如死灰”，把王赶出了门。小说生动形象地说明，张质方之为人，不但为人类所不容，也为禽兽所不齿。

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唐代的佛教、道教在最高统治者及权臣的提倡纵容下，教徒到处横行，危害人民。因而不少进步小说家便通过精怪小说对其进行愤怒的谴责和辛辣的讽刺。和尚变为老虎吃人，精怪变为和尚骗人等内容颇为不少。其中《潇湘录·王屋薪者》篇最为出色。小说先写王屋山上一老僧与老道各自夸耀自己并攻击对方以争佛道优劣。正争得激烈之时，“有一负薪者过”，严厉指责他们说：“二子俱父母所生而不养，处帝王之士而不臣，不耕而食，不蚕而衣，不但偷生于人间，复更以佛道争优劣耶？无居我山，扰乱我山居之人。”并“遂遽焚其茅庵，仗伐薪之斧，皆欲杀之。”这时，“老僧掠走入地”化为一铁铮，道士亦寻化一龟背骨。”骂僧道徒为不养父母、不耕而食、不蚕而衣之人，可谓痛快淋漓，把他们讽刺为精怪所变，更令人沉思。

还有不少的小说则表现了对贪吏的惩罚与诅咒。《宣室志·河南崔守》篇,写贞元中崔君为河南守,他“贪而刻,河内之苦之。”他“常于佛寺中假佛象金,凡数镒而竟不酬值,僧以太守竟不敢言”,可是未几,崔君卒于郡,是日,寺有牛产一犊,其犊项上有向毛若绶出文字曰:“崔某者”,讽刺极为尖刻。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精怪小说中还出现了不少的名篇。这些名篇,既显示了作者的横溢才华,又是作者言志、述怀、抒情的佳作,给后世以极大的深远影响,从内容上看,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小说写了封建社会官场盛衰无常、富贵如云的现象,因而流露了作者浮生如梦的思想。这以李公佐《南柯记》最为有名。小说写吴楚游侠之士淳于棼,他“嗜酒使气,不守细行,累巨产,养豪客,曾以武艺补淮南军裨将,因使酒忤师,斥逐落魄纵诞。”在一次酒醉之后,卧于堂东庑之下。他“解巾就枕,昏然忽忽,仿佛若梦。”突然见二紫衣使者,说是奉槐安国之命来相邀,他“不觉下榻整衣,随二使至前,见青油小车,驾以白牡,左右从者六七人”,他坐了车到了槐安国被招为驸马,娶了漂亮的金枝公主为妻,接着又被国王派任南柯太守。昔日的酒友周弁、田子华也随之飞黄腾达。他上任后,“省风俗,疗病苦……郡中大理(治),”他守郡二十载,风化广被,百姓歌谣,建功德碑,立生祠宇。国王对他极其信任,“赐食邑,赐爵位,居台辅……递迁显职,生五男二女,男以门荫受官,女亦聘于王族,荣耀显赫,一时之盛,代(世)莫比之。”然而好景不长,与檀罗国交战中失利,酒友周弁和公主先后病死。他于是“请罢郡,护丧回国”,回到了京城,从此一蹶不振。小说这样写道:“生久镇外藩,结好中国,贵门豪族,靡不是洽。自罢郡还国,出入无恒,交游宾从,威福日盛”,因而“王意疑忌之”,而且谗言四起,认为一切不详事端,皆“生侈潜之应也。”于是,“遂夺生侍卫,禁生游从,处之私第。”最后,被遣送还乡,他醒来时“斜日未隐于西垣,余樽尚湛于东牖,梦中倏忽若度一世。”随即出外,寻槐之下,有一蚂蚁穴,“披阅穷迹,皆符所梦”,于是他“感南柯之浮虚,悟人生之倏忽,遂棲心道门,绝弃酒色”,三年后卒于家中。小说生动地表现了封建社会官场急遽升降沉浮的社会现实。所以作者在小说结尾时说:“虽稽神语怪,事涉非经,而窃位诸生,冀将为戒。后之君子,幸以南柯为偶然,无以名位骄于天壤间云。”著名学者《国史补》的作者李肇也评论说“贵极禄位,权倾国都,达人视此,蚁聚何殊!”都深刻地点出了这篇小说的题旨。

其次,不少写人妖爱恋的小说已达到了新的水平、新的高度。沈既济的《任氏传》、李朝威的《柳毅传》都是不朽的传世之作。《任氏传》的内容是写人狐相爱。六朝以前的小说狐多作为反面人物形象出现,狐媚男子,但不是爱,而是害人。《任氏传》则另辟蹊径,写得感人肺腑。当郑六发觉任氏乃狐女后,他“虽知之,何患!”对任氏仍一片痴情,爱心不变,而任氏也以“若公未见恶,愿终奉巾栉”,小说生动地描写了她善良、多情、忠贞的品质。她与郑六结合后,不但夫妻恩爱,而且还以智慧抗拒了郑六的好友韦崋对其无礼的施暴行为,并使郑六的生活状况逐日好转。不仅如此,当郑生将赴官任,欲带她同往时,她明知此去途中将遇猎犬而遭不测,但为了丈夫的恳求仍然同去果罹其难,这种对丈夫的深情的确使人异常感动。《柳毅传》中的龙女,在柳毅为她送信而得获救之后,其叔父为媒又遭柳拒绝的情况下,她仍然执着地爱柳毅直到柳毅多次发生婚变,在爱情上屡受挫时,她又化为卢氏女子与其结合,结合后并不言其来历,直到孩子出世时,才将真相告诉了柳,情节感人至

深。

还有一些精怪小说，歌颂了敢于与妖怪作斗争的豪侠人物。《法苑珠林·辛大贤》和《玄怪录·郭代公》篇写得可谓出色。前篇写“隋南阳西郊有一亭，人不可止，止则有祸。”邑人宋大贤“尝宿此楼，夜坐弹琴”，“忽有鬼来登梯，与大贤语，眊目磋齿，形貌可恶。”但大贤毫无畏惧之感，仍“鼓琴如故”，于是“鬼乃去，于市中取人头来”，对大贤说：“宁可少睡耶？”把死人头“投大贤前”，大贤也毫无惧色，并说：“甚佳，吾暮卧无枕，正欲得此。”鬼对他毫无办法，又走了。不久鬼又来说：“宁可共手搏耶？”大贤答应可以，“语未竟，在前，大贤便递捉其腰，鬼但言急死，大贤遂杀之，明日视之，乃是老狐也。自此，亭舍更无妖怪。”后篇写郭元振“自晋之汾，夜行阴晦失道，久而绝远处有灯火之光，以为人居也，径往投之。”但“既入门廊及室下，灯烛辉煌，牢饌罗列，若嫁女之家而悄无人。”接着又“闻堂中东阁有女子哭声呜咽不已。”郭向哭之女子问其因，女子告诉他：此地有一乌将军庙，乌将军“能祸福人，每岁求偶于乡人，乡人必择处女之美而嫁焉。”该女子之父“利乡人五百缗”，暗暗地答应把她嫁给乌将军。当晚，其父和乡人把她用酒灌醉后便送到这里，女子为此而痛哭流泪。郭听后非常气愤说：“吾忝为大丈夫也。必力救之。”于是当乌将军来时，郭假为之贺婚礼，“伺其机，捉其臂而断之”，原来是一猪蹄，后又教育乡人破除迷信，随着血迹发穴，挖出一大猪精，消灭了妖怪，为民除了害，全文写得极为痛快淋漓。

精怪小说中也有一些不好的作品，如女人与动物相交而生子，毫无意义，甚至有些小说把自然界出现的一些稀有现象与社会现实机械地联系起来进行牵强附会的解释，对后世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但这样的作品毕竟为数不多，无损于整个精怪小说的价值，只不过是白璧微瑕而已。

二、精怪小说的艺术成就

精怪小说与写鬼小说比较，有其异同之处，相同之处是故事均为子虚乌有，不同之处是精怪绝大部分都有原形。因而写精怪小说的作家必须紧扣精怪的变化过程也即原形之变和现形这一过程来进行创作。这似乎比写鬼有一定的局限，可是，由于小说家们才华横溢，他们利用这一特点充分发挥其文采与意想，把小说写得妙趣横生，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特色。

精怪化为异物或人类之后，也即现形之前，处处都保持着原形的特点，显得与众不同。而这种特点却又时时地含蓄地或由作者以暗示的方式表现出来，因而写得趣味无穷。《宁茵》中的牛和虎由其自叙身世，在自夸和互相攻击中流露其身份。《元无有》中四怪的身份，在作者对其形貌的描写中已有所暗示，而从其咏诗中更表现得明确。特别有趣的是《酉阳杂俎·长须国》篇。小说先写一士人被风吹至长须国，“此国人皆长须”，后士人被招为驸马，“其主甚美”，然而也“有须数十根”，而且“嫔姬悉有须。”因此他颇为不高兴，赋诗曰：“花无叶不妍，女有须亦丑。”可是该国王听了以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大笑曰：“驸马竟未能忘于小女颔颌间乎！”原来长须国乃虾国，虾无论雌雄均有长须，以胡须为美自非怪事，读之真令人捧腹。

至于精怪的现形，则写得更是丰富多彩。有的精怪一开始就以原形用人言语与人相交，令人遐想；多数则是于情节结束时现形（如《宁茵》、《元无有》）令人回味无穷；也有的则是在情节发展中现形，如《任氏传》就是这样。这样写是为了突出郑六明知任氏为狐而爱心不变之痴情。至于现形的方式也多种多样。一般为直接现形或全身现形。而象《任氏传》中

的任氏开始则是间接现形。郑六知任氏为狐乃是由卖饼胡人介绍:“此中有一狐多诱男子偶宿”,并加上背景的描写:“隙墉弃地”,“其中皆芜荒及荒圃耳。”这种写法更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而写得尤为精妙的是,不但精怪本身现形而精怪的环境也给以生动的描写。《南柯记》中是这样写的:“寻穴竟源,旁可袤丈,有大穴,根洞然明朗,可容一榻,上有积土壤,以为城郭台殿之状,有蚁数斛,隐聚其中,中有小台,其色若丹,二大蚁处之,素翼朱首,长可三寸,右左有大蚁数十辅之,诸蚁不敢近,此其王矣。即槐安国都也。又旁一穴,直上南枝可四丈,宛转方中,亦有土城小楼,群蚁亦处其中,即生所领南柯郡也,又一穴,西去二丈,磅薄空圉,嵌窗异状,中有一腐龟壳,大如斗,积雨浸润,小草丛生,繁茂翳葢,掩映振壳,即生所猎灵龟山也。又旁一穴,东去丈余,古根盘屈若龙虺之状。中有小土壤,高尺余,即生所葬妻盘龙冈之墓也。”这一段生动的描写不但使小说结构完整,前后照应,也更充分表现了作者瑰丽的想象能力,读之余味无穷,美不胜收。

至于传说和杜撰的精怪,由于没有原形,作者更是展开想象的翅膀,对其外貌进行了夸张生动的描写。如《录异记·徐冽》篇对雷神的描写:“元和春,大风雨,堕一鬼,身二丈余,黑色面如猪首,角五、六尺,肉翅丈余,豹尾,又有半服绛棍,豹皮缠腰,手足两爪皆金色,执赤驰,足踏之,瞪目欲食,其声如雷。”写得可谓有声有色。《柳毅传》中对钱塘君的描写也极为光怪陆离:当柳毅与龙王正说到不要让龙女之不幸给钱塘君得知时,“语未毕,而大声忽发,天坼地裂,宫殿摇簸,云烟沸涌,俄有赤龙长千余丈,电目血舌,朱鳞火鬣,项掣金锁,锁牵玉柱,千雷万霆,激绕其身,霰雪雨雹,一时皆下,乃擘青天而去。”这正是钱塘君得知其侄女不幸而愤怒现身去惩恶人时之形象,不但写得有声有色,而且更有气势。想象,夸张,叙述描写熔为一体,何等生动!

由于精怪多种多样,其生活环境广阔,时间空间不象写鬼小说受到限制,因而小说家们写出了很多优美的环境和景物,使人读之产生多种美感。时间空间上的颠倒翻越也使人产生浓厚的情趣。《宁茵》、《柳归舜》中的虎、牛及鹦鹉不但经历了许多朝代,时间有先后几百年甚至一千多年之隔。而且还上下颠倒其时,见到了多少人物,至于环境描写更是各具风貌可谓千姿百态。《柳归舜》中鹦鹉活动地区写得极其优美。而《柳毅传》中龙宫灵虚殿则写得富丽堂皇:“谛视之,则人间珍宝毕尽于此,柱以白璧,砌以青玉,床以珊瑚,帘以水精,雕琉璃于翠楣,饰琥珀于虹栋,奇秀深杳,不可殚言。”《补江总白猿传》中的白猿精住地却又写得极其险峻而秀丽:“南望一山,葱秀回出,时见红采,闻笑语声,扣萝引缙而涉其上,则嘉树列植,间以名花,其下绿芜丰软如毯,清回岑寂,杳然殊景。”这些景物的描写,不但紧扣精怪原形的心性特点,而且也充分表现了作家们笔力功底的深厚。

至于鲁迅对唐代整个小说的艺术成就评为“叙述宛转,文辞华艳”、“施之藻绘,扩及波澜”^[1],这在精怪小说中也是表现得极为突出,而且成就也是高的。

从“文辞华艳”,“施之藻绘”这一点看,主要是指语言的精确、生动、形象和鲜明。由于小说家们大都能诗善文,因此写起小说来可以说是驾轻就熟。笔者认为,凡是各种积极修辞手段,如描写、夸张、比喻、排比等,作家们不但广泛的使用,而且用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再加上诗文有机的配合,使得小说中所塑造的各种形象都栩栩如生。正如王汝涛等说:“写对话则神情如见,状行动则委婉毕肖,发为诗歌可代表作者身份,描写景物,能写出河山壮美。”^[2]总之,由于语言生动文辞华艳,使读者读作品时如亲历其境,亲见其容,亲身感

受事情的演变发展，与作者感情的潮水一起奔流，同生喜怒哀乐，完全融为一体。

从“叙述宛转”、“扩及波澜”这一点上看，主要是指小说的情节和结构而言。从这点上说，虽然每篇小说都有自己的特色，但从总的来看，却有这样一个共同点，它已摆脱了六朝的平铺直叙手法，在情节发展中节外生枝，使其曲折离奇，甚至奇而又奇，颇能使读者屏住呼吸，紧跟作者思路，甚至到了绷弦欲裂的地步，而突然又峰回路转，情绪为之放松，但事情却久萦胸怀不散。前面所举之作品多有此特色。而无名氏的作品《虺蜉传》（《太平广记》题为《徐玄之》）则更能全面体现这一特色。小说写徐玄之“自浙东迁于吴，于立义里居，其宅遂有凶藉”，但“玄之利以花木珍异，乃营之”，接着便看到了虺蜉王子打猎的盛况：“月余，夜读书，见武士数百骑，升自床之西南隅，于花毡上置繒缴，纵兵大猎，飞禽走兽，不可胜计”，接着又描写观渔盛况：“有大铁冠，执铁筒”之人宣告：“殿下将观渔于紫石潭，其先锋后军并甲士执戈戟者勿从。”“观渔”即观捕鱼，而“紫石潭”又指何地？小说这样写道：于是殿下“下马”，与左右数百升玄之石砚之上，北设红拂卢帐，俄而盘榻幄幙歌筵席毕备，宾旅数十，排紫红绿执笙箫管者又数十辈，更歌迭舞”，接着王子便“索渔具，复有携网笼罩之类，凡数百，齐入砚中。未顷，获小鱼数千头”，又“持钩于砚中之南滩，乐徒奏春波引，曲未终，获鲂鲤鲈鳊百余，遂命操脍促膳，凡数十味，皆馨香不可言。”毡上打猎已属奇极，砚中捕鱼，更是妙不可言。然而小说又另生波澜，王子先嘲玄之“发鬓焦秃，饥色可掬”，然后又让玄之陪宴。玄之见“被坚执锐者数千骑自西牖下分行布伍，号令而至”，便“惊呼仆夫”。但这样一下就使得“士卒溃乱，宫车振惊”，王子也“以惊恐入心，厥疾弥盛”。于是玄之被弹劾，被捕，判“置肉刑”。而当行刑时，太史令马知玄又进状为共辩护，状词义正词严，而国王却“览疏大怒”下令斩马知玄于国内。斩后马上又有草泽臣鬻飞上奏，为马知玄辩解，并指出杀马的严重危害性。这时国王似有所悔悟，“即拜鬻飞为谏议大夫，追赠马知玄为安国大将军，以其子蚺为太史令。”然而蚺却不愿为官，上书要求将自己贬斥遐方。国王虽不甚悦，当晚做了一个恶梦，使赦去玄之之罪，并“戮方术之徒”，又“以安车送玄之归。”玄之“才及榻”就马上醒来。天亮后，“于西牖挖地五尺余，得蚁穴三石缶，因纵火以焚之，靡有孑遗，自此，宅不复凶矣。”

整篇小说看来似乎荒诞，但对于统治者的荒淫及昏庸残暴，以及滥杀有功之臣和无辜，揭露得还是比较深刻的。而情节的波澜曲折也达到了惊人的地步。

此外，精怪小说家们还常常在篇末或篇中直接发议论，以表明其写作目的，这除了说明他们确是在“有意为小说”外，还往往对作品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前面关于《南柯记》的评述，已有所引，这里再引用《任氏传》末的一段评论：“嗟乎！异物之情也，有人道焉。遇暴不失节，徇人以至死，虽今如人，有不如者矣。惜郑生非精人，徒悦其色而不征其情性。向使渊识之士，必得揉变化之理，察神人之际，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不止于赏玩风态而已。”“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明确地表达了作者的美学思想，也说明了唐代精怪小说之所以取得突出成就的原因。

参 考 文 献

- 1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鲁迅全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70
- 2 王汝涛、赵炯、余润泽、钱勤米.太平广记选·上.济南：山东齐鲁书社，1980.前言32